

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进

李荣峰^{1 2}

(1.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2.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从佛教传入中国至晚唐,晚唐至晚清,民国时期和建国后至今。隋唐佛教中国化完成后,佛教的慈善思想基本形成。宋以降佛教慈善实践在佛教世俗化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做出适应性调整,佛教慈善在佛教弘法利生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显现出制度化、规模化和地方化等特征,持续至晚清外来文化的介入方始终结。民国时期人间佛教逆势中兴,在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建树,建国后人间佛教继续发展,但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发展一波三折,逐渐边缘化,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和实践逐渐增多。

关键词: 佛教慈善思想; 佛教慈善实践; 人间佛教; 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 D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1(2014)04-0007-04

关于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进问题,学界不乏真知灼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李尚全和何建明于此问题的梳理和总结。李尚全将汉传佛教慈善事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前的传统的佛教慈善模式,讨论了震华法师在《僧伽护国史》中总结的几种模式。第二个阶段是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模式,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模式分为被动模式和制度化模式两种。第三个阶段是当代大陆汉传佛教的慈善模式,主要表现为“灾难危机”模式。^[1]何建明将中国的佛教慈善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佛教传入中国至晚清,佛教慈善具有消灾得福和为来生求得好报的救济功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民国至 40 年代,是佛教界自觉的阶段,尤其对慈悲利他思想的反思和佛教慈善的实践达到了一定高度;40 年代以来对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进一步实践,进一步开展救世利人的慈善事业,并将此视为佛教教育的目的和弘法利生的手段。^[2]

两位学者一个从佛教慈善的实践方面做了梳理,一个从佛教慈善思想的发展方面做了梳理,两者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都是将汉传佛教慈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将汉朝佛教传入中国伊始至晚清、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发展和当代佛教慈善的发展作为一个阶段,特点是都将佛教传入中国伊

始至晚清这个阶段作为“黑箱”,未进行分解研究,而研究相关资料发现,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个阶段佛教慈善的思想发展和佛教慈善的实践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转变的契机在于隋唐时期对佛教慈善的制度化管理和《坛经》的出现。据此可以将佛教慈善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从佛教传入中国至晚唐;晚唐至晚清;民国时期的人间佛教;当代人间佛教。

一、从佛教传入中国至晚唐

佛教慈善思想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而出现,当时的名僧翻译佛经是主要采取“格义”的方式,用道家的语言体系阐述佛经的内涵,不可避免的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这种状况至僧肇方始有所改变。佛学与玄学合流始于魏时盛于东晋,遂开启了独立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自然灾害频发,为佛教慈善思想的传播和佛教慈善的实践提供了契机,佛教慈善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在慈善事业中的影响逐渐扩大,至隋唐则盛极一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佛教慈善思想的相关译著形成

1. 法立、法炬共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佛说诸德福田经》由西晋沙门法立、法炬共同翻译。这部大乘佛教经典,为中国社会输入了大乘佛教慈善

收稿日期: 2014-03-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成果“中国社会福利运行机制对社会工作岗位缺失和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的影响分析”(项目批准号: 10YJA840023)。

作者简介: 李荣峰(1980-) 男,山东沂南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与社会工作。

理论。经中主要讨论了五福田和七福田之说,后世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七法广施福田”经云,“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圜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梵天福。”^[3]通过经文的翻译,宣传了《阿含经》中即提及的福田思想,开启了我国汉传佛教慈善思想的研究,福田思想成为我国佛教慈善的重要根源。“五净德福田”和“七法广施福田”都强调公益慈善的福报问题,宣传福田思想,倡导通过济贫、施药和养护放生等方式获得福报。^[4]

2.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现存《大智度论》(鸠摩罗什译于公元402年-405年)仅余汉文译本。据传鸠摩罗什翻译此论时已经进行了一些删减,只译精要部分,后来慧远又采集其中要旨形成《大智度论钞》。《大智度论》中与慈善思想相关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慈悲思想的阐述,第二十九卷中在四无量心论述中,提到慈、悲二无量。卷二十七里区分了大慈悲和小慈悲,《大智度论》极为重视慈悲思想的地位,认为“慈悲是佛道之根本”。^[5]慈悲思想是佛教慈善最主要的思想来源,后世佛教慈善正是秉持拔苦与乐的精神开展佛教慈善实践。

3. 慧远著《三报论》和《明报应论》。佛教传入中国伊始,即以止恶扬善为使命,及至慧远,佛教慈善思想得到巨大发展。慧远认为只有宣传因果报应说,才能有效化导众生去恶从善,因此依据神不灭思想著《三报论》和《明报应论》,详细阐述因果报应理论。因果报应论是在印度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改造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世报应论”,形成中国文化特点的“三世报应说”。“此一理论成为尔后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说的圭泉”。^[6]

另外,鸠摩罗什所译《梵网经》,汉末三国时期吴国僧人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南朝萧齐天空三藏法师求那毗地译《百喻经》、北魏沙门慧觉等译《贤愚经》,唐代释道世著《法苑珠林》等都从义理以及佛教故事等角度论证了因果业报论的合理性。

(二) 佛教慈善实践的兴起与盛行

1. 魏晋南北朝佛教慈善实践的兴起。最初的佛教慈善实践的主体主要是宫廷中的权贵人物或是受其资助的僧人,大多是“行善积德”式的,按照“福报”、“祈福”等佛教慈善思想进行实践,随着寺院经济的繁荣,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扩大,佛教慈善的范围不仅是施粥等短期的、及时性的救济,在济贫救灾、

施医给药、规诫杀戮和劝善修德等诸多方面都有作为。这一时期主要是佛寺通过布施救济有困难的个人和家庭,通过佛寺中研习医学的僧人,如怀度、佛图澄等,对病患进行免费医治,另外寺院还根据教义劝诫统治者和世俗大众止杀扬善。隋唐时期加强了佛教的制度化管理,佛教慈善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然而佛教慈善制度并非隋唐首创,比如六朝时期,就有僧祇粟制度。^[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慈善实践的模式基本确定,成为后世佛教慈善实践的主要依据。

2. 隋唐佛教慈善的实践。隋唐佛教慈善的实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慈善实践的继承和繁荣,是整个佛教慈善事业史上的重要阶段,与隋唐时期的寺院经济发达有着重要关联,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隋唐时期的佛教慈善已经出现了与官方合作的实践方式,如受官方委托创办机构等,在官方慈善机构不发达的情况下,佛教慈善事业在社会慈善中占的比例较大,并且初步显现出规模化特征。^[8]

这一时期的佛教慈善主要是以寺院经济的形式为主,然而晚唐的会昌法难终结了这一局面,使得禅宗发展逐渐主流化和百丈清规的流行,影响了佛教慈善的实践形式,这些意义深远的变化成为汉传佛教慈善发展的分界线。

二、晚唐至晚清

晚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教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王权框架下,东晋以来的佛教独立发展阶段达到极限。会昌法难后,佛教徒深刻反思佛教的发展状况,佛教思想因应社会条件开始转型,逐渐重视入世思想的传播,“三教合流”、“禅净合一”和“台净合一”为主流的各宗派辗转合流。佛教慈善思想也因而具有世俗化倾向,以此为导向的佛教慈善实践成为王权下公益事业的重要补充。

(一) 佛教慈善思想的世俗化倾向

如果说唐以前的佛教思想强调义理纵向研究的深度,晚唐至晚清时期,佛教思想则主要强调佛教思想的横向发展,强调与儒道等文化的融合,佛教慈善思想也因而转型,由“出世慈善”转型至“入世慈善”,在慈善的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发展。

1. 百丈清规后的农禅思想。农禅思想并非始于百丈怀海,但是经过怀海的发展,使得佛教获得与其他宗派不同的符合自然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独特风格,通过“上下均力”参与耕种,摆脱了传统上依赖布施生存的局面,增强了佛教的生命力。百丈怀海

改造后的农禅思想,主要强调农耕和修行并重,尤其“不立殿、唯树法堂”,对于偶像崇拜进行改革的同时注意法施。通过对寺院经济树立制度,百丈清规后的农禅思想为佛教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保障,使得宋以后的佛教慈善能够有充足的物质支持。^[9]农禅思想强调僧人参与生产,本质是要求僧人入世,否定脱离“红尘”的修行方式,为后来人间佛教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发。晚唐至清,禅宗先盛后衰,大师寥寥无几,虽然各宗有几次中兴,但是再也没有恢复唐以前的兴盛状况,佛教徒积极探索相应法门,因此出现后来一直流行的禅净双修的局面。

2. 功德报应观念的深化发展。此时期功德报应观念本质上是前朝佛教慈善思想的继续,不同的是,前朝的佛教慈善思想主要流行于宫廷之中,而宋以降的功德报应观念则是深入民间。

一般研究认为佛教慈善在经历隋唐的大发展后,宋以降都处于衰落的状态,直至晚清。而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研究看到的都是佛教义理研究的衰落,而非佛教慈善的发展,佛教对上流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尤其是对居士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如明代《了凡四训》等。佛教慈善的实践亟待佛教理论方面的总结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居士对佛教慈善思想的贡献,成为人间佛教发展的“理”。

(二) 佛教慈善实践成为地方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

在百丈清规的自我约束下和《坛经》入世思想的指导下,佛教主动构建王权控制下的发展模式,积极为王权服务,同时注意与当地民俗的结合,佛教慈善的实践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呈现出规模化、地方化和受制度化管理等特征。

1. 规模化参与公共事业的佛教慈善实践。如前所述,唐以后的佛教强调农禅并重,注意发展丛林农业经济,同时通过法会,如水陆法会,祈福等为寺院创造经济收入,使得寺院的经济迅速壮大,所做的慈善事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济贫和医药等布施,像修桥筑路及水利等大型公共工程都积极参与。如宋代泉州的大桥修建,十座中竟有七座为僧人所为,其中安平桥(全长2251米)是中古时期中外最长的大桥。还有元代的凿井等公共事业。黄仲昭《八闽通志》中统计了宋时福建僧人建桥99座,元代40座,明代36座。^[10]

2. 地方化的佛教慈善实践。宋始佛教的发展出现地域差别,北方以律宗为主,南方则各宗都比较发达,各地方的文发展不同,佛教发展也不同,文化发达地区的佛教发展也较为发达^[11]。慈善实践也深

受影响。地方化佛教慈善实践的形成有赖于各宗与当地风俗文化的密切结合。

3. 制度化下的佛教慈善实践。隋唐以降的佛教慈善制度化管理逐渐加深,至晚清达到极限,佛教慈善的机构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慈善机构融合了儒释道的慈善思想为受众服务,佛教慈善思想的入世风貌更加明确。一种是参与佛教思想影响下的官办慈善机构,二是佛教慈善的实践很多都是受官方的委托,并得到制度支持和认可,官方从制度上鼓励佛教慈善的实践,采取奖励的方法“主要有度僧、度牒、给钱、与紫衣、推恩或‘更令勾管’等形式”。^[12]这种制度化下的佛教慈善实践充分发展了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三、民国时期的人间佛教

民国初,佛教逆势中兴,对以往佛教以及中国文化深刻反思,形成契机契理的人间佛教,本质上是对禅净双修的继承和发展,对禅宗的入世和极乐净土观念的整合,以及以中国文化的身份与外来文化对话的成果。在佛教慈善思想发展方面,人间佛教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积极融合中西方慈善思想和理念,对佛教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一) 佛教慈善关注现世的生活化转向

清末学者杨文会面对佛教思想式微和儒家文化难以抵挡西方文化入侵的局面,进一步倡导佛教入世思想,因而出现了佛教入世理念的调整,更引出了后来人生佛教的发展。太虚法师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展人生佛教的宣扬和实践,在《佛法总抉择谭》中对佛教义理进行整理,将佛法划分为三级三宗,开启了人生佛教的理论研究;在《人生的佛教》中认为佛教的本质是不脱离世间的,非纯精神的,是“改善人生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在《生活与生死》中认为佛教的根本精神在于解决生活问题而非生死问题,倡导契机契理的佛法两大原则;在《人乘正法论》、《佛学人生道德》中进一步发扬了“五戒十善”的道德标准,尤其配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说,使得人生佛教具有了更为明确的道德规范。至此人间佛教完成了关注现世的理论论述。

佛教慈善关注现世的生活化转向是对宋以降佛教世俗化倾向的充分概括,其核心是强调佛教慈善在佛教发展中的地位。太虚大师将佛教慈善视作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强调佛教慈悲精神的时代意义。其人间净土理论和契理契机的慈善理念是对佛教慈善理论的创新和补充。^[13]印顺法师进一步将人生佛教发扬为人间佛教,尤其对自利利他合一问题的阐述,强化了佛教慈

善参与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

(二) 佛教慈善实践的组织化发展

民国时期战乱频仍,自然灾害频发,慈善事业空前发展。从事慈善活动的人数和组织数目以及组织的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慈善组织发展为包含官办组织、民办组织和宗教机构的多种类型,其中西方传教士的介入使得宗教类慈善组织亦呈多元化趋势。三种慈善组织里都有佛教慈善的痕迹,佛教慈善此时期还肩负着传承中华慈善文化的重任,因此慈善组织既要弘法还要利生,居士佛教获得发展契机,囊括了政府要员和慈善人士,为佛教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比较著名的有支那内学院、佛学研究会与“佛教居士林”等。

民国时期的慈善实践内容是受魏晋以来佛教慈善实践的模式影响的,仍是赈灾、筑路、掘井等为主,而佛教慈善实践能够及时吸收西方慈善理念创新旧模式,比如开展临终关怀等,拓宽服务的对象和服务范围。佛教慈善资金的来源形成多种形式,如其他慈善组织一样,账目透明,在资金使用上有严格明确的规章控制。正如谢忠毛所说,“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的慈善基本做到了募、收、运、散相分离,定点、定人、定款的赈灾程序,当然这也是民国慈善赈灾的通行之责与经验之总结。”^[14]

四、当代人间佛教

(一) 佛教慈善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契合

建国后的中国大陆的佛教仍然是以人间佛教为主,赵朴初等人积极推进佛教事业的发展,在人间佛教慈善思想方面也有进一步的论述。认为佛教慈善是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佛教徒应该秉持自净其意的利他主义服务社会,以五戒十善、四摄六度为道德典范,发扬“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良传统,努力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愿望。^[15]建国后的佛教慈善思想核心在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汲取传统佛教慈善中契机契理符合时代发展的因素,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慈善思想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空前发展,佛教慈善思想受到现代慈善理念和现代管理学的影响,学者们积极探讨佛教慈善思想的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果。慈善在佛教中的地位进一步明确,方立天认为“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所谓佛教慈善,就是在慈心基础上的清净思想行为。”同时注意强调佛教慈善在慈善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16]

(二) 佛教慈善实践的边缘化

自太虚法师提倡佛教慈善以来,佛教慈善实践

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性,然而,受到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冲击,佛教发展几乎停滞,佛教慈善实践受到严重打击。改革开放后,佛教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目前中国大陆佛教慈善仍然以救灾为主,佛教慈善实践的范围仍然狭窄,缺乏深度,大陆佛教慈善团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等局限,在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发展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结语

综观佛教慈善演进的过程,佛教慈善实践虽然受到西方慈善实践的影响,整体内容变化不大,变化较大的是佛教慈善思想,尤其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变化,佛教慈善思想和理念不断调整适应时代的发展。总结上述内容,当代佛教慈善如果想在新时期有所建树,必须善于借鉴佛教慈善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要善于挖掘传统佛教慈善的经典思想和民国以来佛教慈善的实践方法。

参考文献:

- [1] 李尚全.传佛教慈善事业的理论来源及其实践模式[J].中国宗教,2010(3):65-67.
- [2] 何建明.中国佛教慈善思想的现代传统[J].中国哲学史,2009(3):108-115.
- [3]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卷[M].台湾: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60:683.
- [4] 张国刚.《佛说诸德福田经》与中古佛教的慈善事业[J].史学集刊,2003(4):23-28.
- [5] 大正藏第卷25[M].台湾: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60:26.
- [6] 方立天.慧远与佛教中国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1):28-32.
- [7] 张宏慧.佛教思想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慈善事业[J].许昌学院学报,2009(4):26-28.
- [8] 陈海平.隋唐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7:6.
- [9] 魏琪.农禅一系及其对禅宗的意义[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41-44.
- [10] 苏世枝.宋元以来泉州地区的佛教慈善事业[J].南方论刊,2008(10):91-92.
- [11] 程民生.论宋代佛教的地域差异[J].世界宗教研究,1997(1):38-47.
- [12] 苏世枝.唐宋时期江南地区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9:29-32.
- [13] 李明.太虚大师与佛教慈善[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0):48-56.
- [14] 唐忠毛.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资金的主要来源[EB/OL].凤凰网华人佛教,2011-10-19.
- [15] 杨曾文.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试论[J].佛学研究,2005:5-16.
- [16] 方立天.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EB/OL].凤凰网华人佛教,2011-10-17.

责任编辑:毕曼